

# 文品與人品孰輕孰重

王兆貴

要留清白在人間」。

如果說古代的文化名人類似於現今的文化明星，那麼，這世上有兩種人的紛爭最容易引爆輿情，排在第一的就是文化明星，其次才是政治明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文人的節操也就備受時人關注。文人無行的現象只要一出現，就會遭到輿論抨擊，並被寫進各種紀實文字中，背上千古惡名。比如說柳永，其詞作聞名天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金主完顏亮讀了他關於東南形勝的詞句後，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當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認為他格調不高，朝廷也不待見，考取進士後又被刷掉了，到頭來還是個「白衣卿相」。至於那些為功名所累的人，歷史評價就更是毀譽參半了。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漢文學家揚雄，在安祿山那裡做過官的唐代詩人王維、投靠亂臣司馬頴的西晉文學家陸機、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於己而誣陷蘇東坡的沈括、乾隆御批「實堪鄙棄」的金代文學家元好問、降元為官的宋代書畫家趙孟頫、先降李自成再降多爾袞的明末文學家龔鼎孳等。

其實，不論古今中外，對文化人才的評價，都有一定的難度。或者說，不是一時間、一句話就能界定清楚的。特別是對那些名氣大而又能翻查出污點的文人，自古以來就有爭議，除了文人的地位在不同的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價值觀所致。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並非一成不變，萬世

現今的人絕大多數有文化，如果說一個人沒文化，絕對是最刻薄的批評。本文所說的文人，不是泛指文化人，而是專指古代那些靠筆墨濟世的文化人才，包括以文進身的各級官員，也包括以著述立身的文史學者。

在我國古代，不論在察舉制時期，還是在科舉制時期，文官都是國家人才的主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活躍着一大批文人。上層建築中的文武百官，大都來自文人、社會名流和士紳，也多半出自書香世家和耕讀人家。從主流上看，他們中的許多人，心憂社稷，體恤蒼生，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提出了利國利民的興邦策論，創作了彪炳千秋的詩詞文賦，喊出了振聾發聵的正義呼聲，諫阻了勞民傷財的施政舉措。魯迅曾高度評價說，即便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作為一個群體，中國古代堪稱脊樑的文人雖然很多，但卻不可能是全明星陣容，良莠不齊的現象在所難免，瑕瑜互見的情形並非個案。瑕不掩瑜者倒還好說，最難評判的是那些德才相悖的文人。他們或被稱作才勝於德，或被稱作德遜於才，說白了就是文品上佳、人品較差。對這部分文人的考察評價，歷來存在諸多分歧，至今也無定論。

由於傳統文化積澱厚重，中國文人又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把名節看得比性命還要重要，並衍生出許多關於節操的名言警句。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文天祥在獄中朗吟「時窮節乃見，一垂丹青」。于謙自信「名節重泰山，利欲輕鴻毛」，「但令名節不墜地，身外區區安用求」，「粉身碎骨渾不怕，



■ 中國文人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

網上圖片

不易的，而是隨着時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有所調整。即使有古今中外公認的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也會因其成就和影響的大小，產生不同的評價。管仲背叛公子糾而輔佐齊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貢的疑問時，卻是讚許的口吻，並不認為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來自敵對陣營，他們改換門庭的行為算不算變節呢？每當改朝換代之際，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寧死不為貳臣者畢竟是少數，總有一些文人倉皇失措，尋求自保。對於這部分文人的際遇，有人回護寬宥，認為是順勢應時之舉；有人痛加撻伐，鑒定為厚顏無恥之尤。

原因之二：被評價者知名度所致。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名人，由於備受世人關注，其瑕疵也會暴露無遺。那種以為文人更容易失節，更容易墮落的說法，往往是因此而擴散開來的。其實，在中國古代的名人中，寧死不肯失節的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陶淵明、顏真卿、辛棄疾、方孝孺、顧炎武、文天祥、譚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氣節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嗎？言行有誤、節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蕩的，又豈獨是文人？「此去亂離何日定，向來名節幾人全？」在江山易主、與民更始之際，歸附新生政權的何止是文人呢？據乾隆時期編纂的《貳臣傳》記載，降清的明朝高官多達120多人，文士只有龔鼎孳、錢謙益等幾人。

原因之三：評價者期望值所致。人們對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總以為作品好的文化藝術家，形象也差不到哪裡去。特別是當他們成名之後，期望值就更高了。有位讀者特別喜歡某位作家的作品，每每捧讀都很敬佩。可當她有幸參加過一次見面會，並與之相處並交流過後，頓覺大失所望，發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文人也是人，他們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會因七情六慾而犯傻，就像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傑一樣，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過失。道德審判獨獨偏向文人，是不客觀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髮蘇州》中寫到唐伯虎時，曾感嘆地說：「人品、文品的平衡木實在讓人走得太累，他有權利躲在桃花叢中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麼！深紫的色彩層層塗抹，夠沉重了，塗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潑的中國文化。」

翻開世界文化藝術史你會發現，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後的文化巨匠，也不全然是聖人君子。他們的思想理念、品格節操、行為方式，或有逆於正統，或有異於世俗，或有悖於倫常，為時世所不容。可當若許年後，時過境遷，塵埃落定，人們對前世文人的評價就寬鬆多了。儘管在一些學術專著中，對他們的評價仍然存有較大爭議，但在教材課本中，在普通讀者中，人們主要依據其傳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說話，至於其人品如何，也就不大關心，不大計較了。文如其人也好，人不如文也好，那都是過去事，只要他的辭章文采斐然，就會拿來捧讀，管他是柳宗元還是柳三變。正如錢鍾書所云，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隻下蛋的母雞呢？

## 字裡行間

黃仲鳴

## 我佛山人被腰斬

自小即愛看舊小說，三國水滸西遊封神三言兩拍金瓶梅，真是看到不亦樂乎，迨至晚清，曾樸李伯元吳沃堯諸人之作，也讀個不休。往昔少年迷書，勝過今之捧機而篤者多矣。

只嘆當年貧困，所看之書，多是坊間廉紙，印製甚粗劣，每將「吳趼人」書成「吳研人」，自是印入腦海，宣之於口。及長，涉獵廣，才知乃大謬。其實，在吳趼人生時，已有此錯，甚至有寫作「妍」，益令吳趼人啼笑皆非，曾撰詩有云：「偷向妝台攬鏡照，阿儂原不是妍人。」吳趼人久居上海，漁語通曉，自是「阿儂」矣。

「研」之錯，還錯到令人可笑可惱。話說吳趼人（1866-1910）死後，葬於上海閘北車袋角，後遷寶山縣大場廣肇山莊。石碑粗陋，上書「佛山吳趼人之墓」。吳趼人生前備受「研」之苦，死後仍脫不了此困，直至今時今日的出版界。「慶幸」沒再見有「妍」。

吳趼人乃廣東南海佛山人，故有筆名「我佛山人」。據說有小報與他筆戰，以為「山人」的字義，等諸「山樵」、「山民」之類，換言之，將「我佛」當作另一詞，刊諸報端；吳趼人見而狂笑不已，曰：「我係佛山人，故曰我佛山人，何得竟施腰斬之罪，將佛山二字斷成兩截？佛說未免罪過。」

年前，曾在嶺南大學主講《少林寺中的山人》。所謂山人，即是專寫少林故事的五位作家，包括我是山人陳勁、是佛山人鄧羽公、同是佛山人楊大名、禪山人（姓名不詳）、念佛人許凱如。五人之中，以文論文，我是山人最勁，念佛人較次，是佛山人則是這派的祖師。但，他們全非「山人」，只有「我是山人」才是「山人」，他在處女作《三德和尚》〈自敘〉中便作此自稱：「山人不能不有所言矣。」他是梁啓超同鄉，新會人也；至於另外四人，三人和吳趼人一樣，都是佛山人，只禪山人據推測，極大可能都是佛山人，「禪城」是佛山一區，「禪」就是佛山。因此，四人和我佛山人一樣，名號都不能「腰斬」。

然而，「山人」乃古代學者士人最喜用的雅號，金·元好問有詩：「遺山山人伎倆拙，貧道口畧留他鄉。」《明史·戴良傳》：

「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陳勁效古人，以此雅號而自稱；吳趼人和四技小說家，雖是佛山人，但「腰斬」而成「山人」，也是「韻事」一樁。吳趼人何必動氣？

其實，縱我佛山人一生，都為名號所苦。寓居上海時，所居署「蘭閣」，所撰詩作，以狂草書之卷面，曰《蘭閣詩草》，有不求甚解見之，訝曰：「蘭閣詩草，是誰家娘子作耶？」一時傳為笑談。後來棄「蘭」而「趼」，新居門書「趼廬」，途人見到，笑道：「滬上工藝縱多，然未見有專以磨墨為營生者。」此等途人，誤將「趼廬」作正一「蘭人」。網上圖片

## 生活點滴

吳翼民

## 吃西瓜

夏令消暑佳品無疑西瓜居首。童年時代卻不以為然，只認定棒冰（北方稱冰棍）是天底下最過癮的夏季飲品，想著四分錢一支的水果棒冰或赤豆棒冰含在嘴裡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兒了，及至年長，方始明白棒冰這玩意就是一攤甜水而已，圖片刻之快感，無消暑之功效，只有西瓜才真正消暑解渴啊。

那時江南西瓜多而賤，鄉下農民整船往城裡運，農夫「伊哩伊哩」搖着櫓，農婦拉開嗓門唱着悠揚的叫賣曲，沿河兜售。於是每家每戶都一擔兩擔的買，滾在八仙桌上，隨時剖吃，——上畫用包袱裹上一個兩個，附個舊秤砣，用繩子蕩到天井裡的井內，到下畫取出來，那瓜便冰涼透了，全家團團圍着享用。有一個規矩，那就是必先舀西瓜心敬了老人。我等孩子們還有個任務，即收拾殘局，把瓜子收集起來，洗淨，攤太陽裡暴曬，天天積聚着，積滿了磚罐，放到中秋時節炒着吃，誰不參與勞動，誰就少分炒瓜子或沒份吃瓜子。至於瓜皮呢，就由母親來處理啦，刨去外皮和內瓢，餘翠綠的一薄層，鹽漬着，可拌可炒，與毛豆搭配是夏季可口的啜粥小菜。

三年自然災害及以後的一長段時間，西瓜竟然成了稀罕之物。何哉？緣為它不是糧食，田地必須為種糧讓路，即使農村社員的自留地也須嚴格控制，防止有人種了西瓜去做買賣，叫做「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但鄉下暗中流傳着這樣的話：「養四條腿不如養兩條腿，養兩條腿不如養一條腿，養一條腿不如養沒有腿」，——四條腿指豬羊禽畜，兩條腿指鴨鷄禽類，一條腿指蘑菇草類，沒有腿指魚類、也包括西瓜在。物稀為貴，西瓜少見，便珍貴着呢。記得那時我大姨病篤彌留之際正逢盛夏，想吃西瓜，母親淘了半城，方始高價買得一個，還是個半生不熟的貨。

我下鄉插隊落戶那會兒，生產隊只被允許種一塊田西瓜，那瓜園便成了全生產隊社員的聚焦。隊長派專人守候，防止有人偷瓜。眼看着田裡滾滿了圓不溜秋的瓜兒，我們知青當然最是饑渴，相約摸黑前去偷吃。進得瓜園，守衛的劉老頭居然來個眼閉眼閉，假裝呼呼大睡。我們就一摘一個，用手掌劈開，饕

作者註：羅浮山：位於廣東惠陽，海拔一千二百九十六米，乃嶺南第一名山；東樵山：羅浮山原名，酥醪：原稱蘇蘿，已有六百年歷史，中國古代十大古觀之一；祥鶴舞：形容雲霧縹繞香火繚繞；葛僊：葛洪，我國古代醫學家，著名煉丹大師；粵贊：古代史學家司馬遷對羅浮山的指

暢遊羅浮山偶拾  
東樵雄巖數百峰，酥醪峻壑任葱龍。  
飛雲頂上天齊坐，古觀冲虛抱在空。  
流碧虹霞抱在空，崖遠松濤撲耳隆。  
長生殿供葛僊翁，險道幽峽植密。

詩詞偶拾

曾子游

## 古典瞬間

## 「四海之內皆兄弟」小議

歐明俊

《論語·顏淵》中，司馬牛憂慮地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無）。」同學子夏安慰他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意思是：只要能夠做到敬謹而沒有過失，對人謙恭而有禮儀，那麼作為君子，還擔憂什麼自己沒有兄弟呢？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司馬牛之兄桓魋為宋國大夫，參與宋國叛亂，失敗後逃跑，司馬牛也被迫離開宋逃亡到魯國。故司馬牛不承認他是自己的兄長，感歎有兄弟猶如無兄弟。子夏則認為，「敬」和「恭」是成為「兄弟」的前提條件，恭而有禮，社會上的人都可以成為你的兄弟。如何才有「禮」呢？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關鍵還是「仁」，對人要有愛心。如果人們本着愛心與尊重他人的態度與人相處，那麼無血緣關係的人也可以相處得如親兄弟。

漢代蘇武贈別李陵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意思為：四海之內，大家皆為兄弟，沒有人是陌生人，況且我與你為同一棵樹上相連的枝幹，感情更為深厚。陶淵明《雜詩》其一：「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意謂：我們都生在這片大地上，就是兄弟，又何必在意是不是親兄弟呢？朋友只要感情深厚，不是兄弟，卻親如兄弟，勝過兄弟。《三國演義》中，劉備、關羽和張飛「桃園三結義」，他們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結為異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後世一直傳誦着這個故事，也仿效着焚香結義。《水滸傳》迄今已有多種外文譯本，在所有譯作中，翻譯得最為精彩準確也是最有影響的當數出自賽珍珠筆下的第一個英譯本——《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身逢亂世，為求自保和生存，逼上梁山的好漢們不得不緊密團結，上下平等，以兄弟相稱，增強凝聚力和抗風險能力。這種「泛血緣」觀念，確實讓許多本不相識的人為了共同的利益和理想團結起來。但負面影響也很大，君不見，「有錢有酒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

過度迷信權力，過分自私，慾望膨脹，骨肉兄弟也會反目成仇，甚至自相殘殺。相傳，三國魏曹丕逼迫弟弟曹植七步作成一詩，曹植《七步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詩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來比喻同父母的兄弟，用其煎豆來比喻同胞骨肉的兄長曹丕殘害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當時的秦王李世民在長安城宮城北門玄武門殺死長兄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史稱「玄武門之變」。隨後，李淵詔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下令軍國庶事無論大小悉聽皇太子處置，不久之後李世民即帝位。李世民為了搶奪皇位，竟然殘殺了親兄弟，權力導致人的異化。李建成和李元吉如地下知音，也會感嘆有兄弟不如無兄弟！

現在，經濟全球化，世界變成了「地球村」，其實就是一個大家庭，全世界人民如彼此親如兄弟姐妹，則天下太平，永遠告別侵略和戰爭，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就實現了。



西瓜是夏令消暑佳品。網上圖片